

# 中国教育经济学影响力的成就、 问题与发展探索

——研究立场的视角

张学敏，陈 星

**[摘要]** 经过四十年的探索发展，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已然提升，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产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促进了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形成了一定影响力。但中国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也面临学科边缘化、学者认可度不高、高影响研究成果不多、对微观教育领域影响有限等问题。进一步提升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影响力，关键是要在充分借鉴经济学思维方式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坚持教育学立场，摆脱经济学分支学科和经济学应用学科的认识束缚，并适当注重教育学思维方式的参与，既研究宏观教育问题，也关注微观教育问题，加强教育经济学自身理论、话语体系和研究内容的创新，努力在教育学主流学术圈和学校教育实践中发挥影响。

**[关键词]** 教育经济学；影响力；研究立场

从1979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提出建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算起，教育经济学在中国从萌芽到初创再到发展正好走过四十个年头。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教育经济学已经从稚嫩走向初步成熟，其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研究主题及内容体系日益明确和完善，在服务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影响力。但是，近年来，中国教育经济学在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方面陷入了困境，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许多优秀的教育经济学成果未能在学术界和教育实践中形成较大影响。陈晓宇等在2018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等场合也多次反映：中国教育经济学一方面在研究我国的重大教育问题中产生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建

**[收稿日期]** 2019-06-12

**[作者简介]** 张学敏，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电子邮箱地址：1146760457@qq.com；陈星，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电子邮箱地址：465331219@qq.com。

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路径,教育经济学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在国内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学科的研究立场是一门学科认识与看待问题的所处位置和基本方式,它对学科影响力的形成和提升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将系统总结四十年来中国教育经济学影响力发展的成就和问题,并试图从研究立场角度探索进一步提升中国教育经济学影响力的思路。

## 一、中国教育经济学影响力发展的成就

### (一)学科地位迅速提升

经过四十年的探索发展,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日益明确,本土化的学科内容体系初步建立,以定量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体系逐渐完善,学科发展步入初步成熟阶段。与此相伴,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地位迅速提升,成为一门在教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兴交叉学科。教育经济学学科地位的提升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学科分支和研究问题不断扩展。教育经济学延伸出的主要分支学科有教育财政学、学前教育经济学、基础教育经济学、职业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经济学、继续(成人)教育经济学、特殊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经济学和教育预测与规划学。其中,教育财政学和高等教育经济学发展较快,已经在经济学和教育学领域初具影响。发展至今,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学科基本问题、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人力资本、教育供求、教育成本与收益、教育投入与产出、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财政及其体制、教育与就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教师薪酬、学生资助、教育预测与规划,等等。实际上,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问题一直在持续扩展,其范围既涵盖宏观的教育体制改革与教育政策制定,也涉及微观的学校管理与变革。目前,在宏观教育问题的分析方面,教育经济学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在微观教育问题的分析方面,教育经济学正在产生影响,并在学校绩效分析和学校制度变革中引起反响。

其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声势大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作为我国唯一的教育经济学学术团体,于1980年9月成立筹备组,1984年10月正式成立,是中国教育学会成立较早的分支机构之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力量不断壮大,在辽宁、黑龙江、吉林、湖北、广西等地建立了分会,在许多省市开展了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动。截止2018年底,会员达上千人,新一届理事成员近百名,会员来源覆盖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

经济学分会致力于促进学术交流,在国内教育学界以及国际教育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许多国际知名教育经济学者,如卡诺伊(M. Carnoy)、莱文(H. Levin)、约翰斯通(D. B. Johnstone)、摩根(W. J. Morgan)、金子元久等,都曾应邀参与学会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

其三,《教育与经济》等教育经济学专刊影响日隆。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分会和华中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教育与经济》(1985年),是我国影响最大的教育经济学专刊,也是世界三大教育经济学专刊之一,在海外发行美、英、法、德、日等12个国家。《教育与经济》较早被评为“全国中文教育类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其稿源遍布全国,海外来稿不断。此外,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03年创办的《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和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2016年创办的《教育经济评论》,以及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教育财政”微信公众号等教育经济类的新媒体学术交流平台,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地位提升有所贡献。

其四,教育经济方向研究生培养单位逐渐壮大。我国1983年开始招收教育经济学硕士生,1996年开始招收教育经济学博士生。1997年,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合并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后,教育经济学学位点开始迅猛发展。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2019年的检索数据,目前全国91所高校设有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点,16所高校设有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点。据不完全统计,许多教育经济方向的研究生培养挂靠在教育学或经济学的一些专业(如教育学原理、教育领导与管理、高等教育学、财政学等)下,全国教育经济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单位实际达三十多所。数量庞大的培养单位,为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学科平台,也扩大了教育经济学的影响。

## (二)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

四十年来,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蒋菲、黄维(2014)对1980—2010年20种CSSCI刊物所发表的教育经济学论文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发现,从论文被引频次看,中国教育经济学涌现出闵维方、沈红、袁连生、丁小浩、王善迈、岳昌君、李文利、钟宇平、范先佐、陈晓宇等有影响力学者,并形成了四大主流研究群体: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实证分析学派”、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理论分析学派”、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政策分析学派”和相对松散的“社会分析学派”。

本文认为,特定维度下的局部客观指标(如论文发表情况)无法较为全面地反映学者的影响力,应该依据学者的学术成果、学者对中国教育经济学发

展的贡献和学者在中国教育经济学会的职务情况综合判断学者的影响力,尽管这些指标存在主观性和模糊性。综合学者在以上三方面的表现发现,中国教育经济学在四十年的发展中涌现出三代有影响力的学者:第一代学者包括邱渊、厉以宁、杨葆焜、王善迈、靳希斌、闵维方、陈良焜、范先佐,等等。他们是中国教育经济学发展的中流砥柱,为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教育经济政策的制定、教育经济学后续研究队伍的培养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学界有较大影响力;第二代学者包括袁连生、杜育红、赖德胜、丁小浩、陈晓宇、沈红、刘志民,等等。他们多师承于第一代学者,20世纪90中后期开始教育经济学研究,是当前中国教育经济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多数学者已成为国内知名专家;第三代学者包括孙志军、刘泽云、张万朋、雷万鹏、叶忠,等等。他们多是“70后”,2000年以后开始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是中国教育经济学未来发展的生力军,不少学者已在学界颇有名气。

### (三)学术影响力显著增强

#### 1. 出产一系列代表性成果。

四十年来,中国教育经济学成果丰硕,共出版译著40余本、教材80余本(含高等教育经济学和教育财政学等分支学科)、专著500余本,发表论文近1万篇。其中,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研究成果(见表1、表2、表3和表4),出版了一系列译著丛书和专著丛书<sup>①</sup>。

表1 教育经济学代表性译著一览表(15本)

| 作者   | 书名          | 译者   | 出版社       | 年份   |
|------|-------------|------|-----------|------|
| 科斯坦杨 | 国民教育经济学     | 孙夏南等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1981 |
| 科斯塔年 | 教育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 丁酉成等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1981 |
| 希恩   | 教育经济学       | 郑伊雍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1981 |
| 舒尔茨  | 教育的经济价值     | 曹延亭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1982 |
| 贝克尔  | 人力资本        | 梁小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87 |
| 布劳格  | 教育经济学导论     | 韩云等  | 春秋出版社     | 1989 |
| 科恩   | 教育经济学       | 王玉崑等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89 |
| 舒尔茨等 | 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   | 曾满超等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0 |
| 舒尔茨  | 论人力资本投资     | 吴珠华等 |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1990 |

<sup>①</sup> 除代表性论文采用被引次数作为代表性成果选择指标外,译著、专著和教材的代表性主要依据的是相对主观的研究成果的综合影响力,如历史地位、学术声誉、获奖情况、主文献收录情况、应用和推广情况,等等。

续表

| 作者    | 书名                     | 译者     | 出版社       | 年份   |
|-------|------------------------|--------|-----------|------|
| 卡诺依   | 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            | 闵维方等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0 |
| 惠迪等   | 教育中的放权与择校：<br>学校、政府和市场 | 马忠虎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2003 |
| 约翰斯通  | 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br>出路       | 沈红、李红桃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4 |
| 布里姆莱等 | 教育财政学——因应变<br>革时代(第9版) | 窦卫霖等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7 |
| 金等    | 教育财政：效率、公平<br>与绩效(第3版) | 曹淑江等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9 |
| 布鲁维尔  | 教育经济学                  | 刘泽云等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7 |

表2 教育经济学代表性教材一览表(15本)

| 作者            | 书名         | 出版社       | 年份   |
|---------------|------------|-----------|------|
| 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筹备组 | 教育经济学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1983 |
| 厉以宁           | 教育经济学      | 北京出版社     | 1984 |
|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 教育经济学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84 |
| 韩宗礼           | 教育经济学      |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88 |
| 邱渊            | 教育经济学导论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89 |
| 杨葆焜           | 教育经济学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89 |
| 王善迈           | 教育经济学概论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89 |
| 孟明义           | 高等教育经济学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1991 |
| 范先佐           | 教育经济学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9 |
| 廖楚晖           | 教育财政学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6 |
| 林荣日           | 教育经济学(第2版)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08 |
| 靳希斌           | 教育经济学(第4版)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9 |
| 范先佐           | 教育经济学新编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10 |
| 张学敏、叶忠        | 教育经济学(第2版)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14 |
| 刘志民           | 教育经济学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7 |

表3 教育经济学代表性专著一览表(15本)

| 作者      | 书名                             | 出版社       | 年份   |
|---------|--------------------------------|-----------|------|
| 厉以宁     | 教育经济学研究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8 |
| 秦宛顺、厉以宁 | 教育投资决策研究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2 |
| 王善迈     | 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1996 |
| 靳希斌     | 从滞后到超前——20世纪人力资本学说·教育经济学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95 |
| 张铁明     | 教育产业论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1998 |
| 范先佐     | 筹资兴教：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9 |
| 曲恒昌、曾晓东 | 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 |
| 袁连生     | 教育成本计量探讨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 |
| 杜育红     | 教育发展不平衡研究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 |
| 赖德胜     | 教育与收入分配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1 |
| 闵维方主编   | 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2 |
| 闵维方主编   |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05—2006)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6 |
| 闵维方等    | 教育投入、资源配置与人力资本收益：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研究 | 经济科学出版社   | 2009 |
| 王善迈等    | 公共财政框架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研究              | 经济科学出版社   | 2012 |
| 闵维方等    |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与对策研究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 |

表4 教育经济学高被引论文一览表(被引300次以上, 12篇)

| 作者    | 论文名                | 引用数 | 期刊         | 年份       |
|-------|--------------------|-----|------------|----------|
| 李实、丁赛 | 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   | 685 | 中国社会科学     | 2003(06) |
| 范先佐   |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621 |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 2005(07) |

续表

| 作者      | 论文名                    | 引用数 | 期刊                    | 年份       |
|---------|------------------------|-----|-----------------------|----------|
| 厉以宁     | 关于教育产品的性质和对教育的经营       | 563 | 教育发展研究                | 1999(10) |
| 赖德胜     |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失业        | 518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br>(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1(04) |
| 赖德胜     | 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          | 503 | 经济研究                  | 1998(05) |
| 文东茅     | 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 441 |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 2005(03) |
| 赖德胜、武向荣 | 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              | 405 | 教育研究                  | 2002(07) |
| 王善迈     | 论高等教育的学费               | 371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br>(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0(06) |
| 闵维方等    | 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    | 369 | 高等教育研究                | 2006(01) |
| 岳昌君等    | 求职与起薪：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 316 | 管理世界                  | 2004(11) |
| 周逸先、崔玉平 |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与就业及家庭收入的相关分析  | 310 | 中国农村经济                | 2001(04) |
| 王善迈等    | 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实证分析         | 309 | 教育研究                  | 1998(06) |

注：以上被引次数，截止2019年5月1日。一些非长期活跃于教育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发表的高被引教育经济学成果未列入统计。

## 2. 引发多方面学术争鸣。

中国教育经济学在教育的经济价值、教育的产品属性、教育投资的性质、教育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的构成、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教育的规模与质量、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市场与政府、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过较大范围的学术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关于教育产业化问题的争论。

教育产业化大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领域最大的学术争鸣热潮之一，此次学术争鸣的背景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一段时间后，部分人希望通过教育产业化拉动经济增长，解决教育供给不足、教育经费短期等问题，其核心议题是教育是不是产业以及能不能产业化。此次学术争鸣从改革开放之初延续

到2006年左右,许多教育学和经济学的知名学者如潘懋元、袁振国、纪宝成、袁志刚、杨东平、张楚廷、黄少安、龚放、杨德广、王洪才等参与了此次争鸣,教育经济学者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此次争鸣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以韩宗礼、张铁明为代表的一批教育经济学者在改革开放伊始提出:教育属于产业,教育要走向产业化,产业要实现教育化(韩宗礼,1989;张铁明1998)。王善迈、厉以宁、孟明义、邬大光、吴怡兴、史秋衡、陈晓宇、柯佑祥等一批教育经济学者在此次争鸣勇立潮头,对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和学校企业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教育管理体制变革和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市场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是处理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2006年以来,国内关于教育产业化问题的讨论始终没有中断,新出现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营利性民办学校”“教育供给侧改革”“产教融合”等改革理念和教育现象,又不同程度地引发了人们对新时期教育产业化的特征和利弊的争论。

#### (四)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教育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就具有明显的实践取向,特别关注重大教育问题和教育热点问题的研究,其中许多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对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下四个方面的影响最为深远:

##### 1. 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厉以宁、陈良焜、孟明义、王善迈等通过研究38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育投资和人均GNP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对应不同GNP的国际教育投资平均水平,并据此判断:1982年我国的教育投资水平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当我国的人均GNP达到500美元和800美元时,教育投资占比应提高到3.69%和4.06%(厉以宁,1988)。根据该结论及其后续讨论,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在20世纪末达到4%,4%随之成为其后20年间衡量我国政府教育投资充足的重要标准,也对各级政府增加教育投入提供了激励。

##### 2. 推动教育市场化改革。

教育市场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改革的必然走向,它和教育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学校市场化密切相关。教育市场化大致有三层含义:教育服务提供和生产的市场参与;学校适度借用企业化的运作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在探索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增加教育投入过程中,一些人认为应该走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之路。孟



明义(1999)、王善迈(2000)等迅速廓清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内涵,剖析了教育完全产业化、市场化的危害,明确提出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市场化,教育的产品属性要求政府和市场共同生产与提供教育服务;学校具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不能完全企业化,但可以适当借鉴企业的运作方式;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可以探索如何有效发挥市场的作用,但要注意市场本身的缺陷及其可能引发的教育不公平问题。随后,闵维方(2002)、蒋凯(2013)等系统研究了利用市场机制改革高等教育的积极作用和可能风险。此外,赖德胜等关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研究,陈晓宇等关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丁小浩等关于学校规模经济的研究,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和方面加深了人们对基于市场机制的教育运行和学校经营的认识。这些理性的认识,既促进了教育体制和学校管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也为我国教育市场化的健康运行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 3. 引领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中国教育经济学对我国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是长期的、引领性的、多方面的,其中比较重大的影响如下:

其一,多渠道教育筹资体制的形成。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教育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政府拨款,十分短缺。针对这一问题,厉以宁(1980)指出,在对待我国当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广开就学门路时,不能只着眼于财政拨款,而忽视社会集资。范先佐等(1994)提出,增加教育供给是缓解教育投资短缺的根本途径,不仅要通过制定教育投资法、开辟教育服务的多种税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措施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而且要让企业、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举办教育事业、设立基金、捐款、缴纳学费等方式增加教育投入。随后,王善迈(1996)等从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和教育的外部性角度阐明建立多渠道教育筹资体制的必要性,丁小浩(1996)、陈良焜(1996)等从教育成本分担和补偿的角度提倡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中国教育经济学关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研究,逐渐在《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普通高级中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政策法规中体现出来。目前,我国形成了义务教育由政府主渠道出资、家庭直接负担较低,非义务教育实行政府拨款、家庭交费、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筹资的教育筹资体制。

其二,政府基础教育财政责任上移。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将基础教育的办学责任和管理权限划归给地方，由此形成了农村初中、小学的教育经费筹措和分配由(乡镇)负责，高中及县办初中、小学的教育经费由县财政负责的“两级管理”体制，滋生出学校负债、拖欠教师工资、贫困儿童辍学、教育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杜育红(2000)等研究指出，“两级管理”体制引发了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工资拖欠、学校举债、地区教育不公平等问题，须尽快实现政府基础教育财政责任上移。2001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之后，王善迈、袁连生(2002)等研究指出，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可以提高义务教育投入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但却无法解决教育投入总量短缺的难题，不适应我国各级政府间财力资源与义务教育责任不对称的实际，容易扩大县际、省际和地区间的义务教育投入不公平。应该建立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让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更大的义务教育责任，尤其要建立比较规范的对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经常性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这些研究成果在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政策规划中得到了全面体现。

其三，学生资助体系的完善。1989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发布后，高等学校开始向学生收取费用。到1998年，除特殊专业外，所有高校学生实行收费上学。在教育成本分担成为社会共识和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各级各类教育开始收取学费或杂费。与教育收费相伴而来的是，许多贫困家庭的学生因无力负担学杂费而出现了上学困难甚至辍学的现象。靳希斌(1995)、戚业国(1996)等研究指出，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学生资助制度，在实行差额学费制度和减免学费的同时，建立奖助学金制度、学生贷款制度、勤工助学制度和教育储备金制度，建立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学生资助体系。这些建议在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2001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均有所体现。1999年《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实施后，沈红(2004)、李文利(2004)等明确指出国家助学贷款在政策设计及实施方面存在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2004年6月，政府迅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进行了重大修订。其后，袁连生、刘泽云(2007)等对我国学生资助制度体系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学生资助制度的建议。目前，我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学生资助体系，为大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了资助，让相当一部分学生获得了体面、尊严的

学习机会和教育体验。

其四,教育财政公平促进机制的建立。改革开放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开始扩大,在教育市场化改革、教育收费和教育财政分权的推动下,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差距不断扩大,教育财政公平情况不断恶化(杜育红,2000)。杜育红(2000)、袁连生(2001)、张学敏(2002)等对我国的教育财政不公平现象进行了持续深入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间,我国教育财政不公平,尤其是义务教育财政不公平问题持续恶化,必须通过教育财政体制和教育拨款制度改革、教育转移支付、学生资助等措施,努力实现教育财政中立。这些研究结论在200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和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政策文件中得到了体现。近年来,教育财政公平促进机制的建立缩小了教育财政差异和扶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提高了我国的教育财政公平水平。

此外,王善迈关于教育经费预算单列的建议,以及王善迈、魏新、闵维方、陈国良、李文利等关于高等教育拨款体制改革的建议,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政策法规中有所体现,并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我国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李文利,2004)。

#### 4. 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中国教育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中国教育经济学对教育与经济在各个层面和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为促进我国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厉以宁、崔玉平、丁小浩、曲恒昌、沈百福、叶茂林等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陈晓宇、刘泽云、萧今、闵维方、李桂荣等关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赖德胜、孙百才等关于教育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靳希斌、张学敏等关于教育与消费关系的研究;赖德胜、丁小浩、杜育红、孙志军等关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研究,以及厉以宁、范先佐、丁小浩、赖德胜、岳昌君、叶忠、闵维方等关于教育和就业关系的研究;闵维方、丁小浩、李文利、张万朋等关于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调整的研究;闵维方、范先佐、靳希斌、武毅英、张万朋、曹淑江、高金岭、林荣日、杨秀芹等关于教育产权及教育制度变革和教育体制转型的研究。

## 二、中国教育经济学影响力发展面临的问题

### (一) 学科被边缘现象依然存在

从边缘学科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是教育经济学的努力方向和必然走向。教育经济学是一门介于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边缘学科。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在陆续提出有关教育发展、经济发展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一系列新问题,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自成一套的方法和观点,从而使这门学科逐步发展成为明显地独具本身特点的新兴学科(邱渊,1979)。成为一门既不从属于经济学,也不从属于教育学的独立学科,是21世纪教育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靳希斌,1995)。

学科地位的迅速提升,仍旧没有彻底改变中国教育经济学的边缘学科地位,让其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一方面,中国教育经济学始终没有摆脱在经济、管理学科中的边缘地位。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将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管理学合并为公共管理学科之下的专业后,许多高校的经济、管理类学院开始发展教育经济学。目前来看,除北京师范大学等个别高校外,教育经济学科在所在高校的经济、管理学科中基本处于边缘地位。而且,教育经济学的学术活动范围很少真正进入经济、管理学科。比如,教育经济学会是中国教育学会的分支机构,教育经济学的课题申报和成果报奖主要集中于教育学领域,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教育类期刊,《教育与经济》杂志也被定义为教育类期刊。

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在教育学里依然存在被边缘现象。许多高校尚未将教育经济学纳入本科生课程,以致很多优秀的教育学本科生不了解教育经济学,无法产生报考教育经济学研究生的意愿。多数高校不重视发展教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经常在学院发展规划中受冷落。除《教育与经济》外,教育经济学在教育类杂志的发文占比较低。

### (二) 学者认可度不高

在长安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公布的教育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2017版)中,只有沈红、闵维方、范先佐位列教育学一级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前100名,教育经济学学者在教育学一级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共300名)仅占到3.33%。在教育学二级学科最有影响力排行榜中,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经济学者上榜最多,有沈红、闵维方、岳昌君、丁小浩、文东茅、陆根书、刘志民、史秋衡、李文利等,少量教育经济学者,如范先佐、

袁连生等分布于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二级学科。

从长江学者入选情况看,1998—2017年有24名教育学学者入选各类长江学者,其中只有曾满超教授于2005年以教育经济学科入选长江学者第七批讲座教授,赖德胜教授入选2012年长江学者(应用经济学)特聘教授。从“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情况看,目前只有赖德胜、杜育红、岳昌君属于“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从担任行政职务看,中国教育经济学学者在高校、教育行政部门担任正处及以上行政职务的人员偏少,在高校担任教育学院或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较少。在高校担任过或正在担任校级领导的学者有闵维方、邬大光、伍海泉、吴开俊、严全治等,在高校担任过或正在担任教育学院或经管学院院长(书记)的学者有范先佐、闵维方、赖德胜、陈晓宇、文东茅、李福华、雷万鹏、孙百才、孙志军等,在高校行政部门担任正处级职务的学者有杜育红、高金岭等,陈国良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担任院长。

### (三)高影响研究成果不多

高被引论文数量偏少。截止2019年3月1日,《教育与经济》杂志共刊发文献量2360篇,其中被引用量超过100次的只有25篇,文献最高被引次数不超过300次。而同期《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共刊出文献量6364篇,其中被引量超过100次的有389篇,被引量在300次以上的有39篇。截止2019年4月1日,教育经济学者发表的教育经济学论文中只有12篇超过300次(见表4),这与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论等学科有着不小差距。

高层次获奖研究成果较少。从国家图书奖(后改为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获奖情况看,1992年至今,六届国家图书奖和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共有51项教育类成果获奖,其中教育经济学的获奖成果有:王善迈的《教育投入与产出》获第三届全国图书奖;王善迈主编的《教育经济研究丛书第一辑》(5册)获第五届全国图书奖提名奖;范先佐主编的《教育经济学》作为瞿葆奎主编的《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15卷)之一获得第六届全国图书奖;闵维方主编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获第六届全国图书奖提名奖;陈国良、王善迈、王蓉等参与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编写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获得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袁连生主编的《教育改革大系·教育体制与教育财政卷》作为朱永新主编的《教育改革大系》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不难看出,获国家图书奖的教育经济学成果不多,且2008年以来出现了下降趋势。从获得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情况来看,教育经济学获奖数量较少,获奖论文偏少(见表5)。从全国优博论文获奖看,1999—2013年间

共出现 14 篇教育学优博论文，与教育经济学相关的只有 1 篇(胡赤弟：《教育产权与大学制度构建的相关性研究》，厦门大学，2004)。

表 5 教育经济学成果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览表

| 届次与年份      | 一等奖           |          | 二等奖           |          | 三等奖           |          |
|------------|---------------|----------|---------------|----------|---------------|----------|
|            | 教育经济<br>成果获奖数 | 总奖<br>项数 | 教育经济<br>成果获奖数 | 总奖<br>项数 | 教育经济<br>成果获奖数 | 总奖<br>项数 |
| 第一届(1989年) | 1             | 57       | 2             | 100      | —             | —        |
| 第二届(1999年) | 1             | 27       | 1             | 161      | —             | —        |
| 第三届(2006年) | 1             | 15       | 4             | 73       | 5             | 197      |
| 第四届(2011年) | 1             | 19       | 3             | 90       | 6             | 180      |
| 第五届(2016年) | 1             | 23       | 0             | 85       | 10            | 190      |
| 总计         | 5(论文 1)       | 141      | 10(论文 2)      | 509      | 21(论文 11)     | 567      |

注：数据根据第 1—5 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整理所得，教育经济学者的非教育经济学成果和非教育经济学研究者的教育经济学成果排除在外。

#### (四)在微观教育领域影响有限

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宏观的教育与经济关系和教育经济问题，如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就业、教育制度与体制改革等，对微观层面的学校资源配置和教育教学活动的经济学分析研究较少。教育经济学关于微观教育问题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学校组织与学校管理的经济学分析；学校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学校制度与绩效分析；教育生产函数；教师薪酬。总体来看，微观教育问题的研究在教育经济学研究中处于非主流地位。近十年来，除学校制度分析外，微观领域的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数量明显下降，且缺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的缺乏，导致购买教育经济学研究与指导服务的市场非常有限——表现为宏观的教育财政与教育政策方面的研究与指导的市场需求较少且被少数几家高校垄断，以及需求旺盛的微观的学校与教育教学改革的市场打不开，教育经济学的影响力得不到有效发挥。

中国教育经济学对中小学校及其教育教学改革影响偏弱。基础教育的学校和学生数量庞大，家庭和社会对基础教育的关注度较高，基础教育的学校改进和教育教学改革是教育学者运用教育理论服务教育实践的“主战场”。然而，中国教育经济学偏重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微观教育问题研究关注不够，直接导致其几乎丧失了市场规模庞大的“中小学市场”。目前，中小学校在寻求教育专家指导时很少邀请教育经济学者，而教育经济学者也很少主动

去中小学“拓展市场”。与此相对，教育管理比较重视中小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在服务中小学校的品牌建设、制度变革、文化营造以及教师、班级和课堂与教学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话语权，成功扩大了其影响力。

### 三、基于研究立场的中国教育经济学影响力的发展探索

中国教育经济学当下面临的影响力提升困境，既有学科的方法与体系不成熟、学科发展时间较短的缘故，也有交叉学科的研究队伍繁杂以及交叉学科之间相互融合困难的因素，还有中国教育经济学在研究立场和发展方向方面定位的原因。本文认为，突破研究立场的认识束缚是提升中国教育经济学影响力的关键。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政治立场主要讨论政党、组织或个人代表谁的利益并为谁服务的问题。学科研究立场包括三个问题：学科的研究及发展立足于哪个领域？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研究为谁服务？本文认为，中国教育经济学长期以来倾向于经济学立场：将教育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研究主要使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致力于解决教育经济问题以及如何让教育发展为经济发展服务。这种研究立场，曾为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影响力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现在却成为中国教育经济学影响力提升的限制性因素。因此，提升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影响力，要积极探索转变研究立场，让教育经济学尽快摆脱经济学分支学科和经济学应用学科的认识束缚，立足教育学领域和教育问题的解决，同时要根据研究立场的转变，改进研究内容、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努力在教育学术主流学术圈和学校教育实践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 （一）立足教育学领域，努力在教育学术主流学术圈掌握话语权

提升教育经济学的影响力，首先要让教育经济学从经济学、管理学的分支学科中解放出来，转向教育学领域。现实来看，教育经济学在教育学术圈中形成重大影响的可能性远远高于经济学和管理学。因此，教育经济学要继续在经济学、管理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尽快从经济学、管理学的分支学科中解放出来，将发展前景定位于教育学，寻求学科地位的大发展、大突破。事实上，很多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学者非常优秀，但学界对之影响力评价偏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育经济学没有很好地走进教育学。

提升教育经济学的影响力，需警惕交叉学科立场的危殆。交叉学科对推动学科的综合、融合、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交叉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经常被交叉学科本身存在的一些弊端所限制，这在年轻的中国教育经济学身上

表现的尤为突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教育经济学的交叉性造成教育经济学研究队伍的学科来源比较混杂，教育经济学学者无法像纯粹的经济学者或者教育学者那样，在所在领域持续发表成果和参与学术活动，进而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当前的情况是，一大批教育经济学学者很少长期活跃于教育学领域，一些经济学出身的优秀教育经济学者逐渐转向了经济学领域，不少人甚至是“兼职”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另一例子是，在资源分配和教育评价方面，少数特别优秀（往往又兼有高级行政职务）的教育经济学学者可以在教育学、经济学或管理学中实现“赢者通吃”，多数教育经济学学者往往是两边都不讨好。

提升教育经济学的影响力，有必要将教育经济学的实际研究对象从教育经济问题拓宽至大多数教育问题。从学科划分上看，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领域的经济问题，超出研究对象的研究无益于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也会侵占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违背科学的分工演进逻辑。但从影响力提升的角度看，教育经济学研究必须突破研究对象的边界限定，运用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去解释和解决广泛的教育问题。事实上，教育经济学一直沿袭着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分析教育问题的传统，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在教育政策、教育的制度、组织和行为以及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上初见成效。例如，曾满超关于教育政策的经济学分析，曹淑江关于教育制度和组织的经济学分析，崔卫国关于教育的经济学分析，邓云洲关于教育制度与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崔玉平关于区域高等教育的经济学分析，等等。此外，张维迎、钱颖一等经济学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也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中国教育经济学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实现大范围的思想解放，不断扩大各类教育问题研究，尤其是教育政策研究的教育经济学参与，并及时将相关研究成果整合到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内容体系之中。

提升教育经济学的影响力，要加强教育经济学与教育学主流学术圈的交流。教育学主流学术圈即教育学领域的主流学者所形成的学术交流活动圈，主要由从事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高等教育和教育政策等研究的高水平研究者构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学科性质认识和学科背景的影响，一些优秀的教育经济学前辈没有较好地融入教育学主流学术圈，客观上抑制了教育经济学的影响力。近年来，教育经济学在融入高等教育主流学术圈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未来，教育经济学还要主动向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教育政策等领域扩展，努力在教育学主流学术圈掌握一定话语权。

## （二）调整研究内容，关注新时代的教育价值转向

教育经济学研究立场的转换，势必带来研究内容的调整。教育研究最终



是为了服务于特定的教育目的和价值。一定时期内制定与生成的教育价值取向(包括教育发展和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从根源上决定了教育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为进一步提升影响力,教育经济学需要密切注意新时代的教育价值转向,及时调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当下而论,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教育价值的取向变化,及时调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争取教育学前沿问题的解释权。

其一,关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注重教育资源配置与人民的教育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一再强调:“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既要求教育要提高劳动者素质,造就大批人才,还要求教育要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多样化的教育利益诉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走向。这一教育价值取向要求教育经济学要重点关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资源支撑机制,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的教育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同时要将教育资源配置的评价标准从充足、效率和公平扩展到人民对教育的满意程度。

其二,关注学生的幸福成长,注重教育与幸福的关系研究。教育乃至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最为重要的终极目标是让人获得幸福感,快乐地享受生命和生活。教育不但要关注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还要让学生在教育中获得幸福体验并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做准备。消费是生产的动机和目的,它直接决定着人们需要的满足程度,关系着人们对幸福感的主观判断。因此,教育经济学既要研究教育与生产的关系,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和教育的生产性收益,以化解人类获取资源的能力的有限性与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也要研究教育与消费的关系,提升人的消费能力和教育的消费性收益,以化解人类享受资源的能力的有限性与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张学敏和陈星,2016)。此外,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教育收益、教育资源配置、教育生产函数等问题时,不应该再仅仅将分数、就业和经济增长作为最终目的,而要从幸福着手重新思考教育投入与产出的目标。

其三,关注教育的人工智能化,注重人工智能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研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正以超出人们预想的速度席卷全球。人工智能是未来社会不可阻挡的趋向,它会带来人类生产生活的颠覆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改变现

存的教育制度和学校样态。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极有可能“砍断自由主义本源”(作为20世纪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相信每个人都有其自由意志和存在价值,每个人都有在自由中追求平等的权利),再升级地区和群体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尤瓦尔·赫拉利,2017)。由此可见,未来的教育经济研究不但要关注如何为教育的人工智能化提供资源支持和制度保障,让我国走在世界教育人工智能的前列,而且要关注教育人工智能化的资源配置公平,以免造成更大的教育和社会不公平。

### (三)关注微观教育问题研究,扩大对学校教育教学实践的影响

第一,要继续加强对微观层面教育与经济关系以及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继续深入关于学校组织与学校管理的经济学分析、学校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学校制度与绩效分析、教育生产函数和教师薪酬的研究;另一方面,要探索丰富对学校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方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选择,与学生及家庭的发展需求、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之间的关系等微观层面的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以及学校资源配置与使用、学校绩效、学生学习效率、教师教学效率、学校财务管理等微观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

第二,要不断探索微观教育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尝试探索的一些思路可能有: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引入学校管理的分析中;将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选择的理论引入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分析中;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和制度变迁等理论引入学校制度改革甚至未来新型学校建设的分析中;将博弈论引入学校资源配置、师生关系和教学合作的分析中;将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引入学生学习、教师专业发展、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分析中;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引入学校变革、学校制度演化、师生关系演变分析中,等等。

第三,要探索服务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有效路径。教育经济学者要转变观念,主动利用参与基础教育改革、合作办学、教师培训、科学研究、学校精准诊断等机会和平台,让教育经济学走进学校,积极参与学校变革。

### (四)加强理论和方法创新,用教育经济学身份进行学术对话与交流

将教育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理论方法的直接运用的研究立场,给教育经济学的影响力提升设置了两道障碍:其一,理论方法创新困难。既然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还要不要进行理论方法创新?其二,学术对话困难。尽管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理论和方法分析教育问题常常可以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而且教育受经济条件的制约,经济理性对很多教育行为中具有重要影响,

但教育经济学惯有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印象，很容易引起一些人的误解和反感。不少人甚至认为：教育经济学就是玩数据，不重视人的发展，只关注经济动机，什么都盯着钱，把教育活动看成经济活动甚至市场买卖，把人看成商品，把学校当作工厂，把教育当成商品生产，是违背教育甚至反教育的存在。

要继续提升影响力，中国教育经济学必须从经济学的应用学科的固有印象中走出来，尽快脱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帽子，用教育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独立学科的身份符号进行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中国教育经济学要特别重视理论方法创新，“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创新的学术风范”（王善迈，2017），加强理论的本土化建设，突出教育经济学对人的发展的重视，运用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去解决中国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

创新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既要扎根中国特色的教育实践，还要在思想来源和理论假设等学科基础问题上寻找突破。换言之，教育经济学有必要到经济学和教育学之外寻找新的思想来源。比如，教育经济学可以借鉴经济社会学的一些思想和方法进行理论创新。目前，一些经济社会学者批判并超越了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个体主义方法论和人类行为动机的纯经济目的分析，在试图沟通经济学和社会学并将二者结合运用于分析个人行动、关系、社群、复杂网以及集体的制度与文化如何在一个动态互动过程中形塑社会经济现象方面取得了富有启发和潜力的突破（马克·格兰诺维特，2019）。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可以借鉴经济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及其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

创新教育经济学的方法，既要坚持借鉴经济学的方法，也要认识到经济学方法的局限，积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经济学方法的运用是教育经济学的特色和长处，但过分强调或者唯经济学方法则不利于提升教育经济学的影响力。一方面，经济学方法有其局限性，社会科学研究近些年积累了很多优良的方法，唯经济学方法不利于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博取众长；另一方面，一味强调经济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忽视质性研究方法，不利于产生深邃的教育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不利于某些现实教育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不利于拉近教育经济学与教育学研究范式的距离。

#### （五）改进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促进教育经济学和教育学的沟通连接

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隔阂是教育经济学无法顺利融入教育学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中国教育经济学已经在有意无意地尝试走进教育学。但是，当下中国教育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同教育学存在明显的差异：教育经

济学主要采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定量研究范式 and 经济学话语体系；教育学则长期坚持教育学思维方式，习惯基于哲学思辨、逻辑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等非实证研究范式和教育学话语体系。人们总是习惯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认同和接受其他事物。教育经济学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以资源生产和配置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实证研究范式、统计分析和数学化表达，以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公共产品、外部性、寻租、市场失灵、劳动力市场分割、财政分权、边际成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逆行选择、道德风险、囚徒困境、交易成本、产权等话语体系，甚至是“经济人”假设和教育问题的经济学分析，经常不太容易被一般的教育学者理解接受。更为严重的是，教育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经常让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看不懂，这种理论应用上的局限性无形中扩大了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经验之间的距离，限制了教育经济学影响力的发挥。因此，拉近教育经济学与教育学的距离，一方面要在运用经济学思维方式和理论方法的同时，适当注重教育学思维方式的参与，让教育经济学更加关注人的生命、人的发展、人的幸福、人性及人性的“善”等教育价值和教育立场；另一方面要适当改进话语体系，让教育经济学更容易被教育学者接受。

探索实现教育经济学和教育学的沟通连接是拉近教育经济学与教育学的距离必须解决的一项重要工作。教育学和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价值取向、人性假设、行为动机与过程分析等方面存在不小的鸿沟。因此，教育经济学首先要探索二者的连接路径，努力实现教育学和经济学在教育经济学中的逻辑自恰。关于此问题，可以从教育资源与教育发展(尤其是学生发展)的矛盾或者教育行为的跨学科分析入手，而且一定要突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的价值取向(张学敏和叶忠，2014)。此外，还要注重教育经济学与教育学的沟通，努力消除二者之间的隔阂。完成这项任务，除了加强微观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改进话语体系之外，还需广大教育经济学者，尤其是中国教育经济学会主动建立与教育学主流学术圈的交流沟通机制。

最后特别指出，由于时间、能力和篇幅所限，本文对许多文献和学者的统计与评价不够全面、客观，对许多优秀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没有枚举，使用的一些评价指标的合理性有待商榷，所提的一些思路也比较粗浅。敬请各位同仁包涵指正！

## [参考文献]

- 陈良焜, 1996:《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个人(家庭)成本补偿的必然性》,《教育研究》第8期。
- 丁小浩, 1996:《高等教育财政危机与成本补偿》,《高等教育研究》第2期。
- 杜育红, 2000:《教育发展不平衡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范先佐等, 1994:《我国教育投资短缺的原因及对策》,《教育与经济》第4期。
- 韩宗礼, 1989:《教育产业化 产业教育化——试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教育趋向》,《教育与经济》第1期。
- 蒋菲、黄维, 2014:《我国教育经济学作者的影响力:变化与“学派”——基于1980—2010年20种CSSCI刊物的知识图谱分析》,《中国高教研究》第6期。
- 蒋凯, 2013:《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市场的挑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靳希斌, 1995:《从滞后到超前——20世纪人力资本学说·教育经济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靳希斌、王松涛, 1995:《学生资助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教育研究》第7期。
- 李文利, 2004:《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及重要成果》,《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2期。
- 李文利, 2004:《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现状分析与未来思考》,《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
- 厉以宁, 1980:《论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厉以宁, 1988:《教育经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马克·格兰诺维特, 2019:《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罗家德、王水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孟明义, 1999:《高等教育不能产业化》,《高等教育研究》第6期。
- 闵维方, 2002:《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戚业国, 1996:《收费、贷学金与困难学生资助》,《辽宁高等教育研究》第2期。
- 邱渊, 1979:《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及近况》,《教育研究丛刊》第1期。
- 沈红, 2004:《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与实践中的既成矛盾》,《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
- 王善迈, 1996:《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王善迈, 2000:《关于教育产业化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 王善迈, 2017:《我国教育经济研究的几点思考》,《教育经济评论》第6期。
- 王善迈、袁连生, 2002:《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教育研究》第6期。
- 尤瓦尔·赫拉利, 2017:《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袁连生, 2001:《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不公平探讨》,《教育与经济》第4期。
- 袁连生、刘泽云, 2007:《我国义务教育贫困学生资助制度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第5期。

张铁明, 1998:《教育产业论: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视角》,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学敏, 2002:《贫困与义务: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学敏、陈星, 2016:《教育:为何与消费疏离》,《教育研究》第5期。

张学敏、叶忠, 2014:《教育经济学(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The Influence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in China: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Exploration of Development

ZHANG Xue-min<sup>1</sup>, CHEN Xing<sup>2</sup>

(1. Research Center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for Southwest Minorit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40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iscipline status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elevated, a number of influential scholars have emerged, a series of high-quality academic achievements have been produced. In the meanwhile,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in China have promote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have formed a certain influence. But so far,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in China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marginalization of disciplines, low recognition of scholars, few high-impact research results and limited impact on micro-education. Further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key is to adhere to the position of pedagogy while fully drawing on the thinking mode of economics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 get rid of the cognitive constraints of branch disciplines of economics and applied disciplines of economics, and properly pay attention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inking mode of pedagogy, not only studies macro education issues bu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micro education issues, strengthens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economics' own theory, discourse system and research content, and tries to exert its influence in the mainstream academic circle of pedagogy and school practice.

**Key words:**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influence; research position

(责任编辑:刘泽云 责任校对:刘泽云 孙志军)